

当下,文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市民文学、打工文学、言情文学、暴力文学、网络文学、乡土文学、底层写作、草根写作、美女写作、个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题材可谓广泛,内容可谓丰富,形式可谓奇巧,文学似乎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作家选择以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视角去阐释多元化的生活,去反映时代的变迁,从而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观点,这无疑足令人欣喜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表面的繁荣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内心的沉潜与安宁,风光的背后潜藏着精神的板滞与文学理想的缺席。文学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景观化、肤浅化、粗俗化的怪圈,文学最应该传承的伟大、崇高、理想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当消费享乐盛行于文坛,当追逐金钱名利成为作家惟一的旨归,当心灵越来越空寂、越来越无所依附,当理想、信仰永远成为稀缺资源,当文学的理想主义渐行渐远,对文学理想的呼唤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诉求,引发我们深深思考的一个重大命题。

言说文学理想的可能

文学是人学,它应该直面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呵护色彩斑斓的生命。它在当下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样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文学是我们时代的投影与文化的隐喻与象征,它永远能够表现着这个世界,不仅因为文学栖身于它,也不仅因为文学承担着世界的需求,更因为文学是为人而存在的。文学要对人类的生活进行艺术的表述与解读,生活的复杂决定了文学的多样,它自然可以对俗常的生活做形而下的表象式书写,此乃人性使然;它也更应该秉承理想、信念与崇高,对生活作出形而上的反思。遗憾的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许多作家已经放弃与丧失了对于生活中有理想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的写作欲望与能力,文学与文学理想似乎远离了我们的时代。言说文学理想真的没有存在的可能了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言说文学理想依然并且永远存在可能。

首先,文学具有表述理想与崇高的吁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说:“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者、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马尔库塞说:“艺术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可以为变更那些可能变更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内驱力作出贡

献。”作家可以而且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传承文学理想,砥砺人的灵魂,影响人的行为,以期影响整个社会。萨特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吁求。写作就是向读者提出吁求,要他把我们通过语言所作的启示化为客观存在……艺术作品是一种价值,因为它是一种吁求”。文学应该倾诉理想,向读者发出精神的吁求这是文学的惟一追求。前苏联作家舒克申说:“在我看来,艺术的目的在于帮助人认识生活和自己,使人变得更有人性、更高尚、更美好。真正的艺术永远引导人们通向尽善尽美的境界,永远是真实的,与时代合拍的。”的确,文学作为纷繁复杂、五彩斑斓的生活的记录者、呵护者,对理想的诉求、对崇高的渴望,正是它的文化意义所在。其次,伟大的生活与伟大的时代为文学理想的阐释提供了可能。我们这个时代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同时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近年来,中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变化节奏之快捷,波及领域之深广,让我们目不暇接。空前的城市化进程,急剧膨胀的物质生产,快捷的信息传播速度,都让人叹为观止。在市场化转型与演进的今天,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文学的改变,生活既有消极、落后、阴暗、丑陋,也有光明、温暖、崇高、理想。文学亦然,作家的书写空间变得愈加宽阔,各类文学异军突起,这并不只是文学传统自身的某种技术性和时代性变异的结果,也有潜藏着社会结构中新兴力量的社会书写意图。当代经验瞬息万变,各种思想和价值观亦处于变化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全面崩溃,在一个经验碎片化的时代,如何捕捉住瞬间而永恒的美学和思想价值,这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作家深刻而全面地演出这块土地上新新的风貌,用无比鲜活的形象与细节铭刻下这个伟大时代的记忆,表现这个民族最富活力的呼吸,传达这个时代最本质的情感脉动,呈现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艺术水准。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时代,一个开拓奋进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变革和激情的时代,沿着这一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旅程,书写人生的喜怒哀乐,展示生活的五色斑斓,艺术地描写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意味着时代价值的重构,意味着对社会结构的重新塑形,而不仅仅是文学结构的重新塑形。从这个角度而言,言说文

理论与争鸣

文学理想的时代诉求

□李鸿雁

直言文学理想的困难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文学的理想在时下已被搁置与遮蔽。究其原因,首先,社会转型带来了人们生存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评价方式都发生了深层变异。市场经济使“消费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伴随消费时代一起来到的是文学以工业流水线的方式被营造、被生产、被推广、被观赏、被接受。消费者的需要就是生产的需要,获取最大利益就是生产的终极目的,被产品化的文学同样需要遵循这样的规则,文学的理想与价值标准被搁浅、被市场标准所牵制和左右着,金钱成了衡量作家与作品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条件。马克思说:金钱可以“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金钱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在这个时代被渲染到极致。为钱而创作,为钱而媚俗。迎合批批判来得便宜,低俗比理想来得实在。快餐式、娱乐式以及渲染感官刺激的文学产品,更能满足读者最直接的需求。形态各异的文学实践都与本真的生活与生命毫无关联,更与理想和崇高背道而驰。其次,作家的背叛与缺陷,使写作的多种可能被遮蔽。不得不承认,在当下,言说文学无疑是困难的,在社会历史结构的剧烈演进中,文学的准确定位,文学价值观的合理阐释,都使作家茫然失措。于是作家的心灵无法沉潜下去,背离了当代生活的基本面,风起云涌的文学诸端体态,都不经作家心灵滋养。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的迷失从根子上说是有些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社会背叛的结果。张伟说过在这样“一个充满嘈杂、涨满了各种欲望的时代”,“艺术家对于一种理念的守望,将显得越来越有意义”。毕淑敏也说:“我并不拒绝描写生活中的黑暗与冷酷,只是我们不认为它有资格成为主导。生活本身是善恶不分的,但文学家是有善意的,胸膛里该跳动温暖的良心。在文学术语里,它被优雅地称为‘审美’。”守望理想、守望崇高、守望灵魂、守望信仰,本应该是作家的职责与义务。但是,市场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作家自动放弃了对伟大时代的密切关注与认真思考,更放

弃了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以一种自语的言说方式替代了与时代的深层对话,背弃了理想、崇高、灵魂与信仰。文学本应为大众建构一个精神世界,但在作家那里却转而成瓦解这个世界的有力推手。最后,作家选择躲避理想与崇高。所谓躲避崇高,就是回避价值判断,就是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也就是说,它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相信崇高的存在。黑格尔认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而且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只有禽兽才是真正天真的。”文学最应该表述的理想与崇高,被当代作家搁置了,正是对崇高与理想的放逐,使当代有些作家正在逐渐丧失了那种开掘生活中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的艺术写作能力。除了社会原因以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艺在审美理想上发生了混乱和迷失,即不少文艺作品不以真美打动人心,而是以眩惑诱惑人心。在简单粗糙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思路下,套路化、模式化、类型化地写作不可能对现实问题的复杂状态和深层根源纵深探索并详加呈现。在把一切文化都试图用商业价值来加以判定的今天,创作理想与崇高的文学必然面临空前的困窘,如何克服这种窘况并实现有效的书写,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文学理想的永恒追寻

文学理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了一个令人纠结的语汇。寻求文学理想最可能也最合适的言说位置和言说意义,成为了当务之急。今天,我们提出反“三俗”,难道不是对作家日渐丧失文学理想的惋惜与批评,难道不是对文学理想的热切企盼与呼唤?

文学理想,在今天的时代,也是一种刚性的需要。理想主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文学的

理想主义,是对知识、科学、真理、崇高的求索,是对道德人格的建构,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价值的渴望和呼唤,也是对文学环境和文学审美内容的追求。生活的复杂决定了艺术的复杂,庸常的生活固然渗透着商品化原则,但也包含着崇高与理想,艺术作品也应该而且必须反映这种崇高与伟大、理想与信念。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品也是很多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叙述了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经历,多方位展示了他的个人遭遇,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不幸与民族命运的关系,呼唤对人的价值、科学、知识的尊重。路通的《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地演示了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他们的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贾平凹的《秦腔》用瓷实精到的描写重塑了一个鲜活真实的世界,敏感地捕捉到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种时代情绪,对正在消逝的农耕乡村高唱一曲挽歌,进而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变迁,把握底层弥足珍贵的生长性智慧和历史性经验,并以某种独特的审美形式言说出来。文学写作正应该直面生活、勇于担当、坚守信念、传承理想。正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言,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和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称作文学的。我们当下的文学,应该经得住这样的拷问,我们当下的作家,也必须经得住这样的拷问。这是作家的责任,只有坚守了文学的理想与崇高,我们才可以创造出屹立于世界文坛不朽的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

文学的理想、崇高这些我们的先辈用灵魂与生命去践行的词语,在今天,有了更切实际的意义。曾经的碧水青天、芳草花骨、诗书礼乐、世道人心,渐次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退了,剩下的也许只是欲望滋长的痛苦,一切的追寻和守望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坚守本身就是价值所在。生活中不缺少崇高与理想,文学也不能摒弃理想与崇高。文学理想是文学的血肉,是民族的灵魂与脊梁,文学失去了对于理想的呼唤、对于美的诉求、对于爱的表述,那也就没有了直达心灵的力量,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无论在何时何地,也无论打着怎样的写作旗号,文学写作都不能放弃这种审美理想,它是一个时代的诉求,它的意义弥足珍贵,这就是我们今天探究它的目的所在。

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5)

魔幻的青春与青春的魔幻

□李静玮

对于青春文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觉得青春文学就是写少男少女的故事,有的人认为青春文学多是商业化产物,可读性与内涵均要低于正统文学。而魔幻文学呢,这个名词多使人想到《魔戒》《百年孤独》,那是充斥着魑魅魍魉与奇人异事的世界,同青春文学简单明亮的场景有着迥迥异的差别。但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通过立于传统之上的合理想象以及对几个年轻人的角色设置,将分属两个领域的文字结合在一起,使得作品呈现出魔幻与青春调和的精彩。

同是魔幻青春文学,《小女巫的魔法周记》所记则未必全数基于传统。书中,短头发的中学生林卡走过长长深深的巷子,她经过一只狐狸和一只黑猫,带上家人准备的盒饭,骑着扫把飞向灰蓝的天空,她要毕业考试,得学习咒文符法,还不得不面对家庭的变故与恋爱的烦恼。这是《小女巫的魔法周记》中常见的场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来自东西方的文化元素,比如《封神演义》的九尾狐和西方故事里的黑猫,比如中国古老的巫覡咒术与欧洲女巫的扫帚。20年前,这也许还是过于荒谬的想象,而今,少年带着笔记本去麦当劳复习功课,女孩们既保有对旗袍的憧憬又热烈追逐日韩欧最新一季的时尚,这一切足见本土与外来已越来越亲密,而青春的面貌也日渐蒙上一层对过去而言的幻象色彩。

既是青春,就免不了和成长有关。但凡成长,总是新事物撕裂旧事物,旧事物作别新事物,因而迎接的喜悦与别离的惆怅往往并存,这也是小说情节推动的一个基调。例如林卡面对父母的别离,从起初的依依不舍到后来习以为常,或如她在咒术考试与升学的压力之下,像其他同学一样,努力付出以换取进一步的成长机会。面对恋人与敌人,主人公的年轻使得她心思如此透明,她可以有脉脉分明的喜怒哀乐,可以大声说出拒绝,脸上写满夸张的讽刺,以上种种,均是成年人世界中业已消逝的遗迹。

某些青春文学主题的沉潜与情节的重复受到了批评,有的则简单地将青春文学等同于言情小说。我所尝试的写作力图摆脱这样的思路。这样的想法主要基于两方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小读者群体中,“伤痛式青春文学”的影响对其成长是极为不利的,一些明亮和温暖的文学能够在给予其课外消遣的同时带来更为积极的启发。另外,真实世界中,恋爱显然不是学生生活的主旋律。

纵览《小女巫的魔法周记》,可看到两个几乎对立的特点。首先是小说具有的浓厚生活气息。小女巫可以通过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途径进入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异世界,这与爱丽丝掉入兔洞的构想相类似,但这里的途径包括了学校的后山、树林、居民楼等熟悉的场景,场景中又包含主角能与之交流的动物,种种细节表明,这些故事离现实并不遥远,但又进一步模糊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第二个特点是基于前者的各种超现实成分。同欧洲相比,我国的传说拥有更广大的土壤与更深刻的运用,我试着在文中加入许多中国元素,也不排斥对外国神话的历史,这虽然不能让读者看到完整的东西方文化,但却能从其迷人的细枝末节引发对传统与异文化的兴趣。

最后,每个少年都会成长为他们预想不到的沧桑模样。届时,个体的幻想已进入年近期,一如许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提供的描写样本,婚姻、房产、病故等变动落入成人的生活,激起种种沉重的涟漪。或许,这正是《小女巫的魔法周记》轻松语言后的隐喻,在无偿担当与沉重得难于行进的夹缝间,少年们可以前往不同的未知世界,只是他们需要一切加以留心。

洞察

书评 文艺批评应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读李建军《文学因何而伟大》

□廖四平

面对复杂的文学现状,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和问题: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是否依然有效?传统的文学经验是否能成为当代文学生长的沃土?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坏优劣究竟应该以什么为标准?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学经典和文学大师?如何改变文学评论的空泛虚浮之风?最近,我读了李建军的《文学因何而伟大》(华夏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一书,作者所提供的很多有价值的资料 and 观点,对我认识那些长期困惑我的问题,提供了很多启示和帮助。

《文学因何而伟大》收录了33篇论文,全书虽系单篇文章的合集,但是,在结构上却体现出一种逻辑上的递进感和完整性——全书大致可以分为“关于大师和经典的总论”、“文学与伦理学”、“俄罗斯文学论”、“现代文艺学论”、“中国文学论”、“文学批评论”等单元,而每个单元的论述“指向”大致相同或相似,那就是阐释“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文学的缘故》《真正的大师》《经典的律则》《文学的唯美主义和功利主义》《文学因何而伟大》《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等文,主要阐释文学的意义和伟大之处以及文学经典、文学大师的特点等;《祝福感与小说的伦理境界》《文学与政治的宽门》《美好人物及其伦理意识》《文学主于正气说》《托尔斯泰难题》等文主要阐释伟大作品与伦理学的相通的品质和共有的原则;《站在凯撒的对立面——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精神传统》《俄罗斯经验:文化教养与反对庸俗》《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契诃夫:一只低掠水面的海鸥》《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全面理解契诃夫》《高尔基为什么贬低果戈理》等文,则主要结合具体的作品论述俄罗斯文学大师和作品的“伟大”;《傲慢与黑暗的创作——评〈尤利西斯〉》《为什么是库切》等文涉及现代主义作家,认为现代主义作家的过于强调写作技巧以及一味追求表达的标

新立异等“偏好”,导致其作品不仅缺乏积极向上的道德指向,而且连表达的清晰性和阅读上的可理解性都成了问题,给读者带来的只是沉闷的阅读体验;《〈红楼梦〉的孩子——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模仿、独创及其他——为〈百合花〉辩护》《庸碌鄙陋的下山狗》《〈色戒〉及张爱玲批判》《消极伦理与色情叙事——从小说伦理看〈金瓶梅〉及其评论》《自传与怀念的道理》等文主要论述中国文学史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所论及的作品既有古代的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等,又有鲁迅的小说《色戒》《百合花》等大量现代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文学经验的重视和珍惜,对当代文坛上的消费主义、低俗化叙事等倾向盛行的关注和忧虑;《论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伦理责任》《文学批评:求真,还是“为善”》《文学批评的绝对命令》《猪古检查者与批评豁免权》《小街上的面包店》《水犹如此,人该如何?》则主要涉及文学批评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精神,认为文学批评应该该“公正无私”,应该具有基于“事实感”的求真的精神,而不能一味地“与人为善”,丧失直面问题和说真话的勇气。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一切向钱看”在所难免,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不少人的共同追求,文学艺术也难以免“俗”——往往为了最大的读者群或观众群而不惜牺牲其应有的教化功能,文艺批评或研究也往往漠视文学艺术应有的教化功能。《文学因何而伟大》则旗帜鲜明地强调文学应有的道德教化功能与伦理净化作用,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通过正确的道德伦理观念对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应该像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那样始终保持着对苦难的超越、对理想的坚守,弘扬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人以巨大的精神支持。李建军也反复强调了文学批评的教化功能和重要意义,并援引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批评是人类心灵路程上

打造高品位的访谈栏目

时下的人物访谈里一问一答的方式得以频繁采用,甚受受欢迎。首先它有现场感,更具有真实性;不给予任何修饰的受访者原生态语言又可看出他们的情性、涵养……赞赏这些访谈常常深得启发,名人对事业的执着、对生活的豁达、对事业的领悟,娓娓道来,让读者受益匪浅。但也出现一些充斥“三俗”的访谈栏目,这是对演艺明星的访谈,八卦和绯闻的内容被肆意宣扬,恶意炒作、凭空捏造之诟病竟成栏目“理念”。

期待更丰富更精彩更具品位的人物访谈,采访者对主题的充分把握及对受访者内心世界的逼近,受访者个人非凡的才识和坦诚率真的态度、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对话,双方联手打造出一篇篇艺术性、思想性交融的精品。希望努力做到不仅在于谈话更有谈话背后的睿智,不仅在于观点更有观点撞击的机锋,不仅在于思想更有思想成长的历程。

写散文要精心选好角度

我曾读过梁衡写的政治人物霍秋白、周恩来,真让人回肠荡气。我就想,作家什么时候写出毛泽东呢?后来知道梁衡从取材、构思、动笔到推敲,《觅渡,觅渡,渡何处》写了6年,而《大有大无周恩来》竟用了20年。那么,写毛泽东就更不是一挥而就的了。而我认为在作品漫长而艰辛的孕育过程中,精心选好角度,是决定作品成功的关键。在毛泽东逝世33年后,梁衡的散文《假如毛泽东去骑马》终于问世,作品以独特新奇的写作角度让人惊羡。

写伟人毛泽东,如何立意,何处下笔,确是一个难之又难的问题。作家选择了假如毛泽东骑马走江河这个写作角度,为作品定下了新颖奇崛的基调。这个“假如”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毛泽东的夙愿,有他的五次谈话史料为证。作家捕捉住这一史料,激发了创作想象的灵感。这便是文章的第一部分,是为总起。接着,作家便以走两河的行程为视角,分写出聚焦民生和经济的第二部分——黄河之行,和聚焦政治反思的第三部分——长江之行。而在这两部分中,作家通过毛泽东的“忆想”与“我”的“猜想”,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我”往日访谈的资料,虚实相生、不枝不蔓、合情合理地融合在一起,自然流畅,浑然天成。这样,作品

所描写的毛泽东在实际中、在生活里、在群众间,考察接谈,视事阅人,对许多重大事件进行冷静理智的思考,真实可信地表现了一代伟人的性格、气质、胸襟、思想和感情。

在文章末尾,作家站在历史的枝头眺望,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担当,畅想两河之行结束的1969年9月,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抓经济建设、转变党的作风、总结教训三个决议,当然就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这是历史的大幸,国家的大幸,民族的大幸。这样的活剧虽然没有被重实际、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导演出来,颇为可惜,但梁衡的文章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

高正东(江 苏)

也说“文学批评的三个向度”

《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29日三版载一短文《文学批评的三个向度》。对文艺随笔类文章本来是不必兴师动众地商榷、争鸣什么的,但看看这好像是一篇论文的摘要,其观点正印证了目前文学批评的一些现象,故说几点看法。

文章将文学批评按着眼点的不同分为三类:以研究作者为主的“古典主义”,以研究作品为主的“现实主义”,以借作者、作品来生发自己为主的“现代主义”。并旗帜鲜明地表态:赞赏第三种。且不说命名是否妥帖,情况是存在的,也属常识。但文章为了助证自己的表态,举红日红学痴人说梦为例贬抑作者研究,举毛泽东评《红楼梦》为例贬抑作品研究,这种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立论技巧是不能赞同的。同样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举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褒贬批评者的“写自己”,其实陈著是历史人物研究,并非文学批评,岂不偷换了概念?

实际上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上述三种侧重总是交相为用、不可割裂、不分轩轻的。尤其是当前文学批评中忙于研读文本的空疏理论渐成风尚,所以将“你写出了一个我,我写出了一个我”这样的批评方式定性为“批评艺术的本质”,拔高为“批评者人格的觉醒”,既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时宜的。

顾礼俭(江 苏)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dzhlaxin@sina.com

读者评论